

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

匡存玖

摘要: 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就已在国内开启本土化进程, 历经积极引介、深度研究、自觉整理等多个阶段, 关注视野从文学领域拓展到符号美学、音乐学、哲学、文化学等多个领域, 建构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辩证意义论”“结构功能符号学”“意识形态幻象”等系列焦点论题, 在本土化进程中逐渐上升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三足鼎立的接受格局。

关键词: 东欧马克思主义, 符号学, 本土化

Acceptance of Eastern European Marxist Semiotics in China

Kuang Cunjiu

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early eighties of the last century, Eastern European Marxist semiotics was undergoing a process of domestic localisation in China. After the three stages of positive introduction, in-depth study and conscious furnishing and being researched, Eastern European Marxist semiotics attracted attention first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then in aesthetics, musicology, philosophy, cultural studies and other fields. This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topics like “humanitarian Marxism”, “communicative semiotics”, “dialectical theory”, “structural functional semiotics”, “ideological illusion” etc. Together with Western Marxism and Russian-Soviet Marxist semiotics, in the process of localisation, Eastern European Marxist semiotics gradually became an accepted pillar.

Keywords: Eastern European Marxism, semiotics, localisation

DOI: 10.13760/b.cnki.sam.201801007

东欧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从不同层面展开对西方符号学的批判与吸收,先后建构了结构主义符号学、交往话语理论、交往符号学、实践符号学、辩证意义理论等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在世界符号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像捷克布拉格学派主要代表穆卡若夫斯基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结合创立了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波兰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沙夫在深入推进“语义学到政治符号学”转型过程中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符号学,马尔科维奇基于实践本体论提出辩证意义论符号学思想,丽莎整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语义结构理论建构音乐符号学理论,齐泽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上建立符号能指幻象概念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使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受到积极关注,大量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著作及思想得到引介和研究,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本文将重点关注近四十年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脉络与现状,探索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当代中国的接受历程、核心关键词、影响与不足等论题。

一、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历程

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在国内开启了本土化进程,历经总体引介、深度研究、自觉整理等三个阶段,关注视野从文艺符号学领域逐渐覆盖到符号美学、符号音乐学、哲学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等多个领域。

(一) 第一阶段: 大量译介、总体研究阶段(1980—2000年)

总体特点是:个别东欧马克思主义重要学者受到大量关注,出现了不少符号学译作和研究论文;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受到积极肯定,产生明显影响,促进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进程,为后期深层次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个时期对波兰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沙夫的符号学思想译介显得卓有成效。罗兰、周易翻译了他的《语义学引论》,其书在区分语言学语义学、逻辑学语义学、语义哲学、普通语义学基础上作了大量意义哲学分析。冯克利、

阎克文翻译了他的《作为一种思潮的结构主义》一文，全面评述了结构主义思潮被接受的历程与前景，并向国内学界展示了沙夫结构主义哲学思想。燕宏远、章士嵘、陈道德、袁晖等学者分别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符号意义理论、社会历史与政治心理角度对沙夫哲学思想进行专题解读。章士嵘提出“哲学都有必要从中吸取合理的思想，以便从认识论上对语义问题作出比较完整、系统的说明”（1981，p. 70）；陈道德认为沙夫“从人们的实际交际出发，从实际的语境出发，来分析意义问题。这一提法包含了许多合理因素……他对符号语境的几个要素的分析也是令人信服的”（1992，p. 62）；袁晖赞同沙夫关于“结构主义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方法之一”（1997，p. 17）的论断。于润洋进一步将沙夫语义学理论引入音乐美学研究，认为他“把音乐艺术同他的整个指号理论体系联系起来，将音乐纳入了他的总的指号理论框架中去，从而也就从语义学角度接触到了音乐本质的问题了”（1985，p. 52）。尽管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但客观上又进一步促进了国内学界对沙夫语义学的理论认知。

捷克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穆卡若夫斯基的符号学思想也得到积极关注。邓鹏翻译了他的《标准语言与诗的语言》一文，涉及大量标准语言与诗歌语言的区别与关系、功能、特性等问题讨论，在当代被视为符号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穆氏在本篇论文中特别提出了一个“凸显”（又译“突出”“前推”“前景化”）的概念，在他看来，诗的语言是对标准语言、规范语言、程式化的违反、扭曲，违反准则的方式/形式越多，意识越强烈，吸收了较多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的元素。赵毅衡对此指出，穆氏的诗学理论植根于系统分析、“符号学式的研究方法”（2004，p. 15-16），对其符号学理论给予了充分肯定。此外佟景韩译穆氏的《艺术的意向性和非意向性》、庄继禹译《现代艺术中的辩证矛盾》和《对话与独白》等译作，也涉及其较多符号学思想。还有学者从语言学、修辞学角度研究穆卡若夫斯基符号学思想，诸如郑利民和陈国球的研究。

波兰著名音乐学家卓菲娅·丽萨的音乐符号学理论研究也成效明显。1962年，廖尚果等人就翻译了她的《音乐美学问题》一书，涉及她对音乐的形式与内容、形态与风格、结构与功能、情感与形式、感性与形式等问题的分析。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润洋1980年翻译了她的《论音乐的特殊性》一书，展现了她运用马克思主义和语义理论从音乐领域中物质材料、结构原则、反映现实的方式、社会功能等角度讨论音乐体裁、创作、表演的特殊性问题。于润洋的系列论文还对丽萨音乐符号学理论作了诸多解读，在他

看来，丽萨以建立在交际理论基础上的语义学角度为出发点指出音乐是某种符号的综合体，通过特定音响形式的信息渠道把人类的意识活动、意向和特定的内在经验道传递给听众，鲜明体现了丽莎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性质。

此外，于传勤还翻译了波兰奥索夫斯基的《美学基础》一书，展现了作者早年把符号概念的分析理念引入美学、艺术学领域分析的成果；董学文翻译了捷克希穆涅克《美学与艺术总论》一书，涵盖美学与艺术的“内容与形式”“艺术的符号学问题”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内容；佟景韩翻译苏联学者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方法论体系和论争》一书，其中多为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捷克穆卡若夫斯基、库尔特·康拉德、伊日尔·列维、拉吉斯拉夫·斯托尔，保加利亚潘台莱·扎列夫，波兰雅努什·斯拉文斯基、兹维丹·托多罗夫等人的符号学论文，是国内最早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译著。

（二）第二阶段：重点关注、深度研究阶段（2001—2015年）

这个时期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关注视野、研究深度都有明显提升，专论专著出现不少，影响力持续增强。

穆卡若夫斯基的符号学思想得到深层次关注。周启超、朱涛、张隆溪、方珊、张德兴、汪正龙、王钟陵、方维规等学者对穆氏的讨论涉及大量符号学思想。周启超采用对比考察的方法，指出穆氏放眼“文学自律性与他律性”的互动机制而什氏潜心“文学自律性”，在“对接”与“超越”中实现由“形式主义”推进到“结构主义”，剖析了穆氏符号学的思想渊源。汪正龙探讨了穆氏与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的关联，认为穆氏“较早从符号学观点研究文学，后人特别是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有先导意义”（2006，p.74）。朱涛专注于穆氏研究，其博士论文《结构·功能·符号——扬·穆卡若夫斯基的文学与美学理论研究》及系列论文^①等，细致考察了穆氏的“结构”功能观、“审美规范”与意向性、非意向性等概念，深入到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思想产生语境中全面梳理穆氏结构主义思想，成果极为丰硕。穆氏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成为另一焦点话题。张德兴认为穆氏最具创见的贡献是将文学视为一种符

^① 朱涛的系列论文如《结构主义文论家扬·穆卡若夫斯基研究综述》《从“背离”到“规范”——扬·穆卡若夫斯基对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之超越》《艺术的意向性与非意向性——扬·穆卡若夫斯基文艺符号学思想初探》《扬·穆卡若夫斯基与米·巴赫金：结构·对话·人》《扬·穆卡若夫斯基美学：结构—符号—人》《从“诗性功能”到“审美功能”——布拉格学派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文学功能观之比较》，涉及较多穆卡若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方面的论述。

号进行分析,但他认为其文学观不符合唯物史观。朱涛和高树博充分肯定了穆氏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性质,在他们看来,穆氏“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那里受忽视的社会学的、历史的、辩证法的维度,被穆卡若夫斯基有效地纳入到结构中来进行研究”(朱涛,2001,p.106);“穆卡若夫斯基使自己既区别于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而带有明显的后结构主义特征,又区别于庸俗的文学社会学,而更显示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色彩”(高树博,2015,p.354)。应该说,穆氏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有一次明显思想转向,他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研究融为一体,其理论视野复杂而宽广,从而开启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之先声。

沙夫、丽莎的符号学思想继续受到关注,并进一步拓展到赫勒、齐泽克等学者那里。袁晖、李绍明翻译了沙夫《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书,对其语义学理论及结构主义批判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他们看来,沙夫“在结构主义运动兴起之初明确阐释了自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和看法,显示了作者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2007,p.47)。张碧选译意大利学者佩特丽莉和庞奇奥的长文(2013,pp.181-189),从“语言与现实”“形式矛盾与辩证矛盾”“从符号学角度审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角度详细探讨沙夫语言哲学思想及其渊源,开阔了学界视野。此外,卓菲亚·丽莎的音乐符号学继续受到关注,李小石、梁宝忠等专题解读了她对音乐的特殊性、音乐本质、音乐美学的观点,涉及较多符号学思想论述。

与之同时,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的范式理论、齐泽克的意识形态幻象理论研究也如火如荼。傅其林的系列著作和论文^①对布达佩斯学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赫勒的理论范式进行了深入探讨,极大拓展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关注视野。在他看来,赫勒基于美学、哲学、社会学等跨学科领域建构了一种审美现代性范式;而布达佩斯学派对卢卡奇的美学批判,则体现出了一种富于历史性、宏大叙事、救赎范式的浪漫主义反资本主义美学范式;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学范式的批判,则体现出了一种“碎片式”“散文式”“对话式”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转向。同时,张一兵、韩振江、卢永欣、程斐、王安娜、张秀琴、莫雷等学者对齐泽克的意识形态幻象理论给予了高度关注,出

^① 傅其林的系列著作和论文如《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论布达佩斯学派对卢卡奇总体性美学范式的批判》《布达佩斯学派对历史哲学范式的批判》等,对布达佩斯学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赫勒的理论范式进行了诸多探讨。

现了不少论文甚至专著^①，影响甚大，在某种程度上掀起了齐泽克研究的高潮。在他们那里，幻象理论被解读为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幻象是对现实的一种结构性阐释，幻象建构社会性的符号界及意识形态。它居于形式符号结构与现实世界实证对象之间，既被视为作为意识形态主体的人的存在方式，也被视为人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支撑方式，是对主体欲望及快感的一种操纵或控制。

（三）第三阶段：全面整理、自觉推进阶段（2015年以来）

以傅其林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把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纳入其子课题研究为标志，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力度、视野与范围得到了极大拓展，涵盖了沙夫、卢卡奇、赫勒、马尔科维奇、丽莎、马尔库什等诸多学者的研究，还将进一步拓展到其他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

傅其林的系列论文深入讨论了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问题，极大开拓了国内学界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研究视野。在《论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形式符号美学》《后现代历史意识与审美形式》两篇论文中，他从现代形式的悖论、审美反映的符号机制、形式的历史哲学三个方面，揭示了卢卡奇融合形式符号的复杂结构机制与其社会—历史生成机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赫勒审美现代性理论模式基础上，他进一步深挖了赫勒对当代历史小说中后现代偶然性的历史意识及多元化审美形式，认为赫勒思想显示出了明显的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特质，“她深入洞悉《历史小说》文本中的内在肌理，不论对审美形式的分析还是对民主伦理政治的考量，都不乏启发性”（2014，p. 36），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特色。在《论马尔科维奇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的美学阐释》一文中，他从社会实践本体论基础、意义的辩证分析、意义与交往等三个角度对马尔科维奇的符号本质观进行了界定。在他看来，马尔科维奇的意义理论立足于实践本体论所提出的意义作为“关系复合体”的新界定，以及他从心理意义、客观意义、语言意义、社会意义和实践

① 诸如张一兵的《意识形态幻象对伪现实的支撑——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解读》《物化的信仰与幻象建构的社会现实——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解读》《肯定的犬儒主义与意识形态幻觉——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解读》，韩振江的《齐泽克哲学中的“幻象”理论》，卢永欣的《齐泽克的意识形态幻象理论》《齐泽克：穿透意识形态幻象》，程斐的《意识形态幻象》，马元龙的《症状、幻象与意识形态——论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莫雷的《穿越意识形态的幻象——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等论文，对齐泽克的意识形态幻象理论作了诸多研究。

意义五个维度展开关系复合体的分析,开创了基于实践的意义分析的新思路,也拓展了文学艺术符号意义阐释的广阔领域。在《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思想》一文中,傅其林又进一步从交往及其社会历史基础、符号类型理论、意义交往的可能性等方面深刻揭示了沙夫对审美领域的符号学理解,应该是国内首篇专题讨论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的论文。他把沙夫与马尔科维奇进行比较,认为沙夫交往符号学是在马克思主义语义学基础上进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发展。这种采用与马尔科维奇横向比较和与马克思主义纵向比较方法的研究依据充分、论述有力,给予后续研究者重要启发。此外,陆正兰从音乐意义的多解性、音乐的阶级性与民族性等角度,深入探讨了卓菲娅·丽莎马克思主义音乐符号学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相结合而进一步拓宽音乐学理论广度与深度的历程与贡献。匡存玖解读了布达佩斯学派主要成员之一马尔库什的语言范式和生产范式理论,将其视为马尔库什现代性文化景观及其文化多样性的积极体现。

二、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关键词

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形成过程中既受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受俄苏马克思主义影响,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总体关注实践和人道主义的明显特色,既有关注现代性、历史性批判的布达佩斯学派,也有大量关注语义、交往、对话的沙夫交往符号学,还有明显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倾向的捷克斯洛伐克穆卡若夫斯基结构主义符号学。

(一)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

人道主义是东欧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主题和基本定位,一批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沙夫、赫勒、马尔科维奇、科西克等学者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俄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接受过程中,主张通过恢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寻找超越当时现实生存困境的理论途径,实现了人道主义与语言学、符号学之间的理论融合与创新。

沙夫是关注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从语言哲学、认识论和人道主义角度展开深入思考并积极推进从“语义学到政治符号学”的转型,建构了既有鲜明马克思主义语义特色又有鲜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交往符号学理论。傅其林认为沙夫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事实上迥然不同于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而是以“拥护人的尊严、自由、全面发展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价值为标志的人道主

义的意义理论，这无疑是对符号意义拜物教的批判”（2015，p. 21）。的确，沙夫的交往符号学理论强调从交往过程的整体性中来理解意义，从符号情境出发来审视交往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的关系意义，包括相互交往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人与现实的关系、人与符号的关系、符号与现实的关系、符号体系中一个符号与另一个符号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他是基于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的角度来思考符号的意义问题，强调符号意义的社会性与人的需求，体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色彩。

马尔科维奇的辩证意义理论也体现了明显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特征。傅其林认为：“马尔科维奇的辩证的意义理论就是通过符号化过程的人道化，批判符号意义的异化，对抗‘词语的专政’，认为只有通过言语、符号的使用，人类才成功地创造他的社会，成功地在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中与其他人群建立交往和合作联系。”（傅其林，贾冰，2015，pp. 317—334）在马尔科维奇那里，自在事物可以在实践过程中成为“为我们”的存在物，包含着“他者心灵”，并在人与自然的生存斗争中形成了社会交互性维度，构建主体间性的社会文化结构。在他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要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解释工作，不能脱离人和人的经验，这些都需要人在历史中进行自我实现。此外，布达佩斯学派主要代表赫勒的交往话语理论也涉及大量人道主义元素。傅其林认为，赫勒的“现代性问题是关于人的现实存在的问题，美学是成为日常生活的主体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克服异化，走向好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2006，p. 3）。她的审美现代性思想张扬一种人道主义美学，一种具有现代性或者后现代性特征的人道主义美学，这种人道主义美学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对官僚体系的人道主义的批判，是日常生活的人道主义化，因而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美学。

总的来看，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与语言学、符号学的深度融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新气象，也克服了纯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片面性，可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提供某种启发。

（二）辩证意义理论

马尔科维奇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深入西方意义理论尤其是英美实用主义符号学的骨髓，实现“实践派”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密切关联，从社会实践出发开创性地建构了具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特征的辩证意义理论，既超越了斯大林主义理论模式，也超越了反映论、再现论的意义分析。

傅其林认为：“马尔科维奇的辩证的意义理论的目的在于对符号意义与交往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切入到当代社会和谐的文化思想，根本上来说是确立意义的社会规范基础问题。”（2015）在他看来，马尔科维奇意义理论基于实践的交往共同体而形成的，通过消除误解到达有效交往，从而到达哈贝马斯理想的意义分享的世界。与西方现代意义理论不同的是，其意义理论不是忽视人的存在与价值的纯粹符号论，而在一开始就内在于人的实践之中。杜世洪对马尔科维奇意义辩证论及准则进行了细致考察，在他看来，马尔科维奇意义理论堪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代表学说，代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语言学转向，强调了语言交际功能和社会起源说，符合马克思主义语言问题的基本精神。其意义辩证论强调实践的作用，意义作为符号的各种关系的复合，与社会实践活动密不可分，在学理上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有相似之处。宋铁毅指出马尔科维奇尝试以实践人道主义思维范式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理论逻辑上从人的“现实—潜能”的二元结构走向彻底的历史一元论，建构了一种“现代批判的社会哲学”。总的来看，马尔科维奇的意义辩证论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基础上融入了大量符号学、语言学色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较好整合。

（三）语义与交往符号学

交往是基于符号中介的意义理解问题，是语言哲学、符号学关注的重要论题。傅其林认为，沙夫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最早也是最有成效开掘语言学符号学的思想家，他从社会历史视角在批判西方语义学理论上不断推进“语义学到政治符号学”转型，把符号分析置于社会的交往过程中重新阐释符号语义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语义学建构了一种交往的符号学理论。波兰学者安杰耶夫斯基从另一个角度认为，沙夫对有关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思考，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有关语言、知识、文化和交往的作用的间接表述，据此提出了语言交往的模式（2015，pp. 12—15）。总体而言，沙夫的交往符号学具有重要理论价值，较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更具开创意义，他深入西方符号学理论之骨髓并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理解，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视野；其提出的符号类型理论、符号情境概念、语词的模糊性问题对符号学也是一种推进，对深入理解文学艺术符号问题可提供很好参照。

赫勒的交往理论也受到了国内学界的关注。李央《阿格妮丝·赫勒的交往理论研究》是国内学界专门探讨赫勒交往理论的一篇论文。在他看来，赫

勒交往理论涵盖哲学、艺术和日常生活三个层面，在哲学中交往表现为“关于价值的讨论”，联系着不同的价值理念；而在艺术中，交往表现为对高级艺术的“阐释”以及“交谈文化”中的自由地交换观点和解释，联系着多元艺术作品和艺术真理；在日常生活中，交往又表现为一种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和反映的日常交往，沟通着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在哲学方面，赫勒希望通过揭露不平等权力关系去构建一种自由人的平等交往的理想社会；在艺术中，希望通过交往使艺术突破自律的牢笼，达成一种多元交往的美学；而在日常生活中，希望通过人与人的自由、平等的交往，建构一种人道主义的交往模式。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相比，赫勒交往理论不及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深刻广博；与沙夫交往符号学相比，沙夫偏重于语义与社会历史角度考察，而赫勒交往理论具有宏大叙事和时代性、历史性，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四）结构功能符号学

穆卡若夫斯基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在关注文学艺术形式结构研究之外，还注意到了对文学艺术外部世界、功能与社会等方面问题的考察。正如高树博所说，“他积极吸收形式主义、语言学、现象学、逻辑实证主义等资源来思考文学的根本问题：文学性。他的致思路径始终涵纳着两端：文学与社会”（2015，p. 354）。他把文学艺术视为一种符号事实和社会事实，注重考察文学的形式功能、社会演变，已经开始从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研究，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色彩。朱涛对穆卡若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他看来，穆卡若夫斯基从结构、功能和符号这三重方法论范畴出发，建构起独具特色的结构主义文学与美学理论，堪称对早期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那些矫枉过正的理论学说的一种克服。穆氏不再把研究对象局限于文学内部，而是拓展到整体的艺术和文化，既重视对审美客体的结构进行研究，而且综合考察艺术成品、审美客体与审美价值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把接受者的维度纳入到思考中来。可以发现，穆卡若夫斯基把在俄罗斯形式论学派那里受忽视的社会学的、历史的、辩证法的维度有效地纳入到结构中来进行研究，重视结构与结构的研究，迥异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结构主义的理论思潮。

（五）审美现代性与意识形态幻象

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代表人物赫勒通过对古代、文艺复兴时期、现代到后现代等系列问题的研究，揭示了包括审美在内的现代性形成机制、结构功

能特征以及不可克服的悖论,把审美的现代性问题和审美历史意识研究与审美形式、语言学、符号学思想结合起来,也呈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特色。傅其林在其博士论文《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中辟专节讨论了赫勒审美现代性结构、功能等问题。在他看来,赫勒在东欧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浪潮中不断推进卢卡奇的历史小说理论和文学伦理批评与历史批评的关联,建构了一种新人道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为后现代历史意识与审美形式的融合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意识形态幻想理论是齐泽克基于弗洛伊德特别是拉康精神分析理论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严泽胜对齐泽克意识形态幻想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看来,“齐泽克根据拉康的幻象理论重构的‘作为幻象的意识形态’概念,是继阿尔都塞之后,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又一重要推进”(2011, p. 106)。齐泽克把幻象纳入拉康式的“想象界、符号界、实在界”层面考察,在他看来,实在界被符号界预先假定,同时又被符号界结构创造。在想象界,幻象是实在界的直接显现;在符号界,幻象是结构现实的机制;在实在界,幻象又是“现实感”与实在界的中介(韩振江, 2009, pp. 263—275)。齐泽克的意识形态幻象理论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和价值,他阐释了意识形态幻象对现实世界的建构与缝合,揭示了意识形态幻象对主体的欲望和快感的操纵和控制,有利于我们穿越意识形态幻象和认识意识形态幻象背后的虚无事实(莫雷, 2009)。

三、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的成绩与不足

近年来,东欧马克思主义及其符号学受到国内学界的积极关注,一些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如穆卡若夫斯基、沙夫、赫勒、马尔科维奇、丽莎、齐泽克等学者的符号学思想受到积极关注,像穆卡若夫斯基的符号学思想出版了专著,沙夫、马尔科维奇、齐泽克、丽莎等学者的符号学思想有了专论,促使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在本土化进程中取得了积极成绩,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新领域。但也有明显不足之处,正如彭成广所言:“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符号美学思想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2016, p. 19)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符号学思想流派众多、异彩纷呈,除国内学界熟悉的穆卡若夫斯基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沙夫的交往符号学、赫勒的“交往话语理论”、马尔科维奇的辩证意义理论、齐泽克的唯物主义符号学外,还有施陶尔美学符号学、奥索夫斯基新马克思主义符号美学、沃伊茨克的实践符号学、格劳斯的符号学辩证唯物主义派的游戏符号学等。由于语言障碍等种

种原因，较多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还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未做引介和进一步的比较分析，有待整理和研究。

东欧马克思主义及符号学研究在国内学界经历了一个长期酝酿的发展过程，终于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俄苏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接受进程中，取得独立的接受地位，逐渐形成目前三足鼎立的本土化接受格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东欧马克思主义影响有限，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一般笼统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下介绍，甚至国外马克思主义也笼统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而论之，如冯宪光所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就把以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实践派”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野进行研究。正如前面所说，尽管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也得到了不少关注，译介成果和论文也出现不少，但总体影响不大，一些研究成果多为总体或概论式的介绍，缺乏深度研究的专著、博士论文。这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普遍状况。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以来，在以衣俊卿为代表的一批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积极推动下，东欧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并逐渐取得了独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受到国内学界大量关注的地位。同时，以傅其林为代表的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者在积极推进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研究的过程中，也积极关注和有意识地推进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明确提出和专题研究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使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以更加舒展的姿态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俄苏马克思主义并排呈现在国内学界面前。周启超、朱涛、傅其林、张一兵等学者的论著，系统深度地揭示了穆卡若夫斯基、赫勒、齐泽克等学者的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贡献甚多，为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开辟了宽广的研究视野。

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克服了语言文化研究上的重重障碍。应该说，国内学界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本土化过程的最大障碍就是语言问题。受语言的限制，较长时期以来，国内学界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译作较多转译自英文或俄文，特别是符号学这块，由于种种原因更多源自于英美学界。比如对穆卡若夫斯基的研究，国内直接从捷克文翻译过来的文献就较少，我国最初对穆卡若夫斯基的接受主要借道英美学界，后来才是俄国学界。对其他东欧国家也基本如此。目前这种现象已经得到了明显改观，在衣俊卿团队、傅其林教授等的引领和努力下，开辟了专门的“东欧马克思主义译丛”，一系列东欧马克思主义著作如赫勒的《日常生活》，马尔库什的《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

本质”的概念》《语言与生产：范式批判》，马尔科维奇的《实践》，沙夫的《作为社会现象的异化》先后译介到了国内，对推进东欧马克思主义及其符号学理论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傅其林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把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项目纳入子课题研究范围，进行符号学文献的专项整理和研究。一些专注于东欧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外学者还被邀请到中国作面对面的交流，将积极推进国内东欧马克思主义及符号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目前国内学者通过留学、访学等形式，与东欧马克思主义学者直接建立了联系，并在国外杂志如《论题十一》发表了有影响力的论文。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东欧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将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产生更加积极的推进作用，影响也将越来越广泛深远。

引用文献：

- 安杰耶夫斯基，博莱斯瓦夫（2015）. 马克思主义语言交往的问题（陈飞，译）. 学术交流，8，12-15.
- 陈道德（1992）. 沙夫意义理论述评.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60-62.
- 傅其林（2006）. 阿格妮丝·赫勒审美现代性思想研究. 成都：巴蜀书社.
- 傅其林（2010）. 布达佩斯学派对历史哲学范式的批判. 求是学刊，5，24-29.
- 傅其林（2014）. 后现代历史意识与审美形式. 文学评论，6，34-38.
- 傅其林（2015）. 论沙夫的马克思主义交往符号学思想. 学术交流，8，6-23.
- 傅其林，贾冰（2015）. 论马尔科维奇马克思主义意义理论的美学阐释. 中外文化与文论，29，317-334.
- 高树博（2015）. 穆卡若夫斯基在中国. 中外文化与文论，29，354-368.
- 韩振江（2009）. 齐泽克哲学中的“幻象”理论.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263-275.
- 莫雷（2009）. 穿越意识形态的幻象——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吉林大学博士论文. 长春.
- 佩特丽莉，苏珊，庞奇奥，奥古斯都（2013）. 亚当·沙夫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及社会批判（张碧，译）. 载于曹顺庆，赵毅衡（主编），符号与传媒，3.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 彭成广（2016）. 中国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基本主题述评. 学术交流，269（8），16-21.
- 汪正龙（2006）. 穆卡洛夫斯基的美学思想——兼论布拉格学派的美学贡献.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6），73-78.
- 严泽胜（2011）. 齐泽克：作为幻象的意识形态. 世界哲学，6，106-113.
- 叶传汗（1986）. 有关阿·沙夫语义学理论的几个问题——和于润洋同志商榷. 音乐研究，

1, 118—120.

于润洋 (1985). 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 音乐研究, 3, 43—61.

袁晖 (1997). 沙夫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4, 14—18.

袁晖, 李绍明 (2007). 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视界中的结构主义——亚当·沙夫《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译本序.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3, 47—50.

章士嵘 (1981). 读沙夫的《语义学引论》. 哲学研究, 11, 67—71.

张一兵 (2004). 意识形态幻象对伪现实的支撑——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解读. 山东社会科学, 11, 26—30.

张一兵 (2005). 物化的信仰与幻象建构的社会现实——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解读. 东南学术, 1, 123—127.

赵毅衡 (2004). 符号学: 文学论文集.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朱涛 (2010). 结构·功能·符号——扬·穆卡若夫斯基的文学与美学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 北京.

作者简介:

匡存玖, 博士, 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美学。

Author:

Kuang Cunjiu, Ph. D., lecturer of School of Humanities,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fields are Eastern Europea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aesthetics.

Email: 476033678@qq.com